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谈人生

二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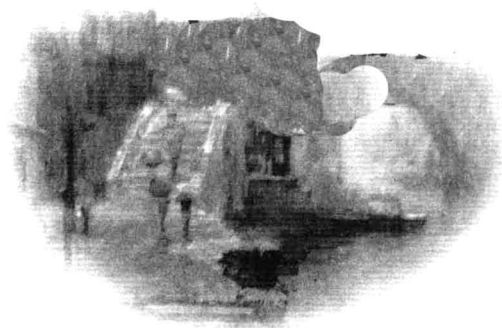
人生本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
每个人的生命史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编：邓九平

谈人生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人与政治思想(节录)

金岳霖

然而,谁需要政治思想呢?如果提供了政治思想,它必定是提供给某些人的。我们必须记住,政治中基本的东西就是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以及对这一权力加以运用的模式。如果从任何时代获得的客观环境的角度来看,该模式已不能满足使政治网球赛能开场得利的话,那么,控制权将必须易手。如果这种易手能不经革命取得,则万事大吉;如果必须经革命取得,那么革命就会来临。在任何情况下,不同集团的强干、活跃而无情的人们,都将会互相争斗。这些人都是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演员,没有他们,将不可能有激动人心的政治戏剧。

147

这些人的活动是无法阻止的。这些人构成任何社会的天然贵族。到处都可以发现他们,在银行和工会,在资产阶级、也在无产阶级之中。如果对于任何规模广大的政治行动,客观条件还未成熟的话,他们就寻找别的领域去征服。但如果客观条件允许发动一场政治意义深远的运动,他们就成为了政治领袖。无情具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柔和者可能以别的方式继承一个世界,但决非政治的方式。那些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决不能成为政治家,那些由于任何形式的心灵稚弱而可能被妨碍作到这一点的人,也不能成为成功的政治领袖。坚定地献身于事业是可钦佩的,并且往往是真诚的表现,不过在它背后的心理学现实则总是一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的同胞们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对于这些人类领袖,政治思想一方面是一种华丽的外观、一种尊严的姿



态,从而能把追随者吸引过来;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有效的掩盖,使他们的精力得以发泄,野心得以实现,而最后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的同胞。

正是对于这些人,政治思想才作为他们的行动的一种外观而被提供出来。为了避免一个很可能会有误解,应该说明,本文并不是支持伟人理论的一种论据。伟大这一概念包括各种不同的评价,一个人可以因其人品或行为或二者兼之而被人尊重。一个人被尊重的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于另一个人被尊重的原因。无论如何,人的伟大关系着规定性的价值标准,而非描述性的品质。伟人可能存在,但伟人理论是否有效则是完全另一个问题。我们在本文中不涉及它或他们。本文描述那种强干、活跃而无情的人们是为了表明他们在政治体中的职能,而非社会给他们规定的并堆砌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价值。他们可能是恶棍、无耻之徒、无赖、讨厌鬼或伟大的人。单是中国历史上就充满了恶棍和伟人变成有力的政治领袖甚至于王朝建立者的例证。他们怎样根据不同的价值标准而被评价,这对于本文的目的无关重要,起作用的是他们的功能。

也许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上述这一点可能带来一种甚至更惊人的安慰。毕竟尚有其重要意义的那种伟人理论不仅肯定伟人的存在,而且也肯定他们不顾客观条件而实现他们的意愿。换言之,领袖们只是领导,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被领导的。现在,虽然本文主张强干、活跃而无情的人是政治领袖,但并不断言他们永远不被领导。只有理论家们才坚持领袖们只是领导,而领袖们本身却足够现实得不管他们实际上是领导还是有时候也被领导。他们的要务是当事情成熟时抓住机会,或是像古代的费边那样等待时机。他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要么获得机会要么就等待机会,但他们不能无视机会。他们所代表的观念可能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或是从不事实践的思想家们那里借来的,或仅仅是俯拾皆是的思想潮流中的一些条目,但是,一旦他们拥护这些观念,他们也就成了实现这些观念的工具了。如果



在政治思想中,他们究竟是师傅还是徒弟毫无不同的话,那么他们究竟是强加于他们同胞们的那个意志的创造者还是它的单纯的工具就更无关紧要了。这里无须讨论究竟是时势造人或人造时势。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正是仅仅有些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人,正是政治中强干、活跃而无情的那种类型的人才起作用,不管他们究竟是圣徒或魔鬼、徒弟或师傅。

不过,实际政治中的领袖照例很少同时又是政治理论家的。擅长理论的人作实际工作一般都不能干,反之亦然。马克思无疑地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伟大宣传者,然而他却不是它的政治家,如果给他以斯大林的地位,他也许不会有后者的成功,而极可能的是他会作为一位哲学家而痛苦。如果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满足于作为从群众的压抑之中爆发出来的盲目冲动的工具,他们可能是悲剧性的,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伟大的。但是当他们企图同时进行理论化时,他们就仅仅变成为滑稽可笑的了。把这两种任务结合起来,就会在整体上贬低了这一方或另一方。在较早的时代有些例外,但在近代,当分工已发生在人类努力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时,作一个统治者是很难同时与作一个理论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工作将比以往更加落入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对鼓动人心的政治观念推波助澜,并企图通过强干、活跃而无情的人在政治上继承这个世界。

描述性地当作一种外观来看待政治思想并不意味着贬低理论家或政治家;他们在政治体中各有其职能和存在的理由。指出他们的不同是本文的部分目的。附带也提到,本文仅仅是对政治思想的思想,而并不是政治思想本身的主题。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我曾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里更清楚地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似乎是恰当的。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其次是功利境界,然后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151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因为只有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行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



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随着未来的科学进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可是人的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来的哲学来满足。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在这方面，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

精神的境界

明道之后，集义既久，浩然之气，不待勉强，自然而然生出，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下文说：“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轲认为，告子是从外面拿一个义来强制其心，使之不动，这就是“义袭而取之”。实际上行义应是“心”的自然的发展；行义既久，浩然之气即自然由中而出。

孔丘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何以能不惧呢？孔丘说：“内省不疚，复何忧何惧？”（《论语·子罕》）孟轲的“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是孔丘的这种思想的发展。他说：“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尽心上》）这就“行无不愧于心”。孟轲认为，这样



就可以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愧怍，因而无所畏惧。这就是所谓“至大至刚”。这本来是一种精神境界或心理状态。孟轲认为，这种状态，“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另一种说法。

《孟子》中论“浩然之气”章是孟轲言论中的重要部分。它不是讲道德教条，而是概括地讲一种精神境界。它不仅是概括地描述了这种精神境界，而且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他所说的“浩然之气”的那个“气”并不是一种物质，像空气、雾气那种气，而是一种精神境界或精神状态，像勇气，或气概的那种气，那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境界，但是可以转化为客观的物质力量。孟轲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是就有那种境界的人的自我感觉说的，也是就那种精神境界转化为物质力量说的。孟轲讲：“浩然之气”是靠“养”出来的，就像树苗一样，养树的人只能给树苗安排好的生长条件，至于生长还得它自己生长，不能拔之使高。高是不能用拔的方法取得的，拔高就是“助长”。“助长”不但于树苗无益，反而于它有害。这就可见，“浩然之气”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物质，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

浩然之气的主要内容是不动心，在《孟子》的这一章的开始。孟轲和他的学生公孙丑谈到“不动心”。孟轲说，仅只是一个不动心并不难，告子就能比他先得到不动心。下文说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不动心。但是不动心也有二种情况，一种是强制其心使它不动。另一种是心自然而然地不动。第一种办法是比较容易做的，但是那种不动心，也不是真的。其实那个心已经动了，不过被强制住不能表现于外。第二种办法是比较难的，可是所得的不动心才是真的。心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使它自然而然地觉得富贵、贫贱、威武，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稀奇，所以它也就不淫、不移、不屈了。这就是真正的不淫、不移、不屈。这是有那种境界的人自然而然的表現。可是这种境界，只能是养出来的，而不是可以用强制、拔高、助长的办法



得到的。有了这种境界的人，才能是至大至刚，无所畏惧，而独立于天地之间。

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生活。《孟子》中的这一章，是孟轲对于这种精神生活的概括的叙述和深刻的分析。这是人类精神生活，在中国的深刻的反思。

宋朝的宰相文天祥作了一首《正气歌》。这是用诗的形式和形象的语言讲“浩然之气”的。他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然塞苍冥。”照他的说法，“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这显然是与孟轲不合的。下文列举了中国历代的忠烈人物的事迹。然后总结说：“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些人不是用语言讲“浩然之气”，而是用行为讲“浩然之气”。他们都写了一篇“浩然之气”的赞歌，可是，不是用墨汁写的，而是用鲜血写的。当然文天祥的《正气歌》也不仅是用墨汁写的，而是用鲜血写的。

无论如何“浩然之气”这四个字到现在还是一个常用的词汇，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词汇。懂得了这个词汇，才可以懂得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谈知识分子

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当。后者只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前者兼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各家不同。因为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的道德标准，就是儒家的标准。曾子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仁是儒家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有这种境界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即所谓“完人”。孔丘把完人做为士的标准，这可以算是最高的标准了。《礼记》中的《儒行》特别着重士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其中托为孔子的话塑造了一个士的具体形象，说：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在才学方面有足够的准备，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行动只能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强迫，“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的标准的內容。并不是一般的士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个标准，特别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人们所传诵。

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动摇的时候，黄宗羲写了一部《明夷待访录》，为他所理想的未来的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画了一个蓝图。照他所想的，在政治机构中，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宰相，第三个是学校。黄宗羲仅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西洋，并不知道西洋的历史，更不知道西洋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这个设想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机构中的君主、内阁和议会。他怎么会把学校也拉扯到政治机构中去了呢？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政治力量。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如果爆发为群众性的运动，力量就更大了。在魏晋时代，司马昭要杀嵇康，太学生数千人出来，要求司马昭任命嵇康到太学当他们的老师。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抗议。在宋朝，当金兵打到开封的时候，太学的学生出来要求抗战。有一个宋朝人写的笔记，很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一次学生运动的经过。据他说，在南宋定都在杭州的时候，外省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杭州，原来杭州的府学，实际上成为太学。学生们评论国事。政府中的人觉得他们很讨



厌，有人建议只准在杭州有户口的学生留下，其余的都离开杭州。学生们反对，指出这是像战国时秦国的“吏议逐客”。他们的抗议没有发生效力。被迫离开杭州的学生，约定一个日期，到期都带着行李，背着书，排成队伍走出来。还发了一篇《告先圣文》，只有三十四个字，说：

斯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返世无闷，呜呼士乎！谨告。

学生还散发诗歌，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说：

我今束书归天涯，
不惜一去惜国家。

当然，黄宗羲还有他自己的经验，明末反对宦官的东林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其根据地是东林书院。黄宗羲父子都参加了这个集团。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坏的时候，康有为在1897年乘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机会，串联两千多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众性运动。以后，新式学校办起来了，学生的政治运动（当时称为学潮）更时常出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尤为显著。

从黄宗羲以前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看，“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力量。黄宗羲把学校排在与君相并立的地位，这是有根据的。

当然，详细分析起来，康有为以后的士和其以前的士有所不同，在其以前的士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以后的士就不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了。不能期望以前的士有反对地主阶级的行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表现在反抗当时政治上的不良倾向。在中国历史中，皇帝的大权往往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使政治陷于混乱。士的政治力量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黄宗羲的东林党就是以反



抗宦官而显示出士的力量。

再总括几句：从隋唐以后，士就不是地主阶级贵族，而/口、是“四民之首”了。他们掌握知识，继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凭藉科举的渠道上升为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军，或后备军。其不愿应科举考试或者考试中失败的，留在民间，或从官场中退出来，回归乡里，成为一种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对派，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当时称为“清议”，这种士当时称为“清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与西方接触的时候，首先倡议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人也是知识分子。可见，士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在精神境界方面，士还有更高的理想，周敦颐说：

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第十》）

这就是士所希望达到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精神境界。对于这些境界的阐述以及达到的方法，就是道学的内容。



人生问题发端(节录)

傅斯年

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照我现在的学问思想而论，决不敢贸然解决他。但是这个问题，却不能放在将来解决；因为若不曾解决了他，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所以不揣鄙陋，勉强把我近来所见，写了出来，作为我的人生观。还要请看的人共同理会这个意思，大家讨论，求出个确切精密的结束；我这篇文章，不过算一种提议罢了。所以题目就叫做人生问题发端。

158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是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就是说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绝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就思想而论，“凡事应当拿是非当标准，不当拿时代当标准”；他们讲，“从古所有，乌可议废者。”就人生而论，我们说，“凡人总当时时刻刻，拿公众的长久幸福，当做解决一切的根本”；他们说，“无念百年，快意今日。”这样的相左，那能够有接近的一天？要是还想使他同我接近，只有把我这根本观念，去化他的根本观念；如若化不来，只好



作为罢论；如若化得来，那么就有共同依据的标准了，一切事项，可以“迎刃而解”了。什么“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己；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我们姑且不必请他领会，还请他“少安勿躁”，同我们讨论这根本问题。

这根本问题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吗？我答道，不但不能说互相独立，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有这样特殊的思想式，就有这样特殊的人生观，有那样特殊的人生观，就有那样特殊的思想式，两件事竟断不出先后，并且分不出彼此。要是把这两题作为一体，往深奥处研究去，差不多就遮盖了哲学的全部。但是这样研究，作者浅陋，还办不到；而且实际上也没大意思，不如就形质上分作两题，各自讨论。所有思想式一题，等在本志第三号上讨论去。现在把人生观念一题，提出来作个议案罢。

—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谈论人生问题，若果不管西洋人研究到什么地步，可就要枉费上许多精神，而且未必能切近真义。因为人生的各种观念，许多被人家研究过了，尽不必一条一条的寻根澈底；径自把他的成功或失败，作为借鉴，就方便多着了。所以我在评论中国各派人生观念以前，先把西洋人生观念里的各种潮流，约略说说。一章短文里头，原不能说到详细，不过举出大纲领罢了。

Ludwig Feuerbach 说：“我最初所想的是上帝，后来是理，最后是人。”这句话说的很妙，竟可拿来代表近代人生观念的变化。起先是把上帝的道理，解释人生问题。后来觉着没有凭据，讲不通了，转到理上去。然而理这件东西，“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被 Intellectualists 和其他的 Classical Philosophers 讲得翻江倒海，终是靠不着边涯。于是乎又变一次，同时受了科学发达的感化，转到人身上去。就是拿着人的自然，解释人生观念；简捷说罢，拿人生解释人生，拿人生的结果解释人生的真义。从此一切左道的



人生观念，和许多放荡的空议论，全失了根据了。我们考索人生问题，不可不理会这层最精最新的道理。

人对于自身透彻的觉悟，总当说自达尔文发刊他的《物种由来》和《人所从出》两部书起。这两部书虽然没有哲学上的地位，但是人和自然界生物界的关系——就是人的外周，说明白了。到了斯宾塞把孔德所提出的社会学，研究得有了头绪，更把生物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人生上去；于是乎人和人的关系，又明白个大概。后来心理学又极发达，所有“组织”(Structural)“机能”(Functional)“行为”(Behavioristic)各学派，都有极深的研究；人的自身的内部，又晓得了。这三种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都是发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学家主张的总是“进化论”(Evolutionism)，从此一转，就成了“实际主义”(Pragmatism)。法国出产的“进化论”(Evolution Creatrice)也是从进化论转来。什么 Life Urge 和 Life Spirit 虽然一个说科学解释不了，一个更近于宗教，然而总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并且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各面。这并不是我专用比傅的手段，硬把不相干的，合在一起，其实各派的思想，虽是“分流”，毕竟“同源”。所以 B. Russel. 1 在他的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里，竟把这些派别归为一题，叫做进化论派。Eucken 在他的 Knowl. edge and Life 里，也常合在一起批评去。我把他合在一起的缘故，是因为都是现代思潮一体的各面，都是就人论人，发明人之所以为人，都不是就“非人”论人。我们受了这种思潮的教训，当然要拿人生解决人生问题了。

但是现在为说明之便，却不能合拢一起讲下去，只得稍稍分析。论到小节，竟是一人一样；论大体，却可作为两大宗；第一、是生物学派；第二、是实际主义派，现在不便详细讲解他，姑且举出他们两派供给于人生观念最要的事实罢了。

生物学派，拿自然界做根据，解释人生。他所供给人生观念最切要的，约有以下各条：

(一)使人觉得他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晓得以己身顺应自



然界。

(二)古时候的“万物主恒”之说,没法存在了。晓得各种事物,都是随时变化的,晓得人生也在“迁化之流”(A Stream of Becoming)里头可就同大梦初醒一般,勉力前进。许多可能性(Possibilities)、许多潜伏力(Potentialities),不知不觉发泻出来。现在人类一日的进步,赛过中世纪的一年,都为着人人自觉着这个,所以能这样。

(三)古时哲学家对于人生动作,多半立于旁观批评的地位,没有探本追源,而且鼓励动作的。自从“生存竞争”发明以后,又有了“生存竞争”的别面——“互助”,一正一反,极可以鼓励人生的动作。这个原理仿佛对人生说道“你的第一要义就是努力”。

(四)古时哲学家的人生观念,有时基于形上学,尽可以任意说去,全没着落,生物学派把这些虚物丢掉,拿着人的地位一条发明,尽够弃掉各种“意境”的代价而有余。从此思想中所谓“想象的优胜与独立”(Imaginary Superiori and Independence)不能存在,总须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这样一转移间,思想的观念变了,人生的观念变了。因为思想从空洞的地方转到人生上,人生的范围内事,多半被思想揭开盖了。

(五)看见人类所由来的历史是那样,就可断定人类所向往的形迹必定也是那样。所以有了尼采的“超人”观(Ueberrmensch)。尼采的话,虽然说的太过度了;但是人类不止于现在的景况,却是天经地义。从此知道天地之间,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生的真义,就在乎力求这个“更多”,永不把“更多”当作“最多”。

以上都是生物学派所供给的。但是专把生物学解释人生,总不免太偏机械的意味。斯宾塞也曾自己觉得他的生活界说不切事实,说:“生活的大部分,不是生理化学的名词能够表现的。”所以从生物学派更进一层,就是实际主义的说话。现在把这主义给人生观念最要紧的道理,写在下面:

(一)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